

新世纪经典译丛 The new century's Series of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甘甜”与“光明”

——马修·阿诺德新译8种及其他

[英] 马修·阿诺德 著 贺涓滨 译/评

Sweetness and Light

河南大学出版社

GANTIAN YU GUANGMING

“甘甜”与“光明”

——马修·阿诺德新译 8 种及其他

[英]马修·阿诺德著

贺涓滨 译/评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甜”与“光明”——马修·阿诺德新译 8 种及其他/[英]马修·阿诺德著;贺涓滨译/评.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649-0264-3

I. ①甘… II. ①阿…②贺… III. ①文学评论—英国—近代
IV. ①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8246 号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尚希萌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市精彩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9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感于阿诺德的批评美文(代序)

Inspired by Arnold's Critical *Belles Lettres* (as Preface)

凌波 译(Trans. Libby Kong)

我对阿诺德长期以来都怀着特殊的敬意。之所以特殊,并不仅仅在于对他的尊敬程度,还因为一种亲切、亲近和亲和的感情与感受。我很早就开始读康德和黑格尔,那是远在大学本科二年级和三年级的青春时代,是在水天一色、红绿掩映的铁塔湖畔。那诚然是少年意气,但也真读懂了一些,或掩卷沉思,或拍案惊奇,发出观止的感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遥远的德国古典哲学感动 20 世纪的中国学生,也是自然不过的。但是这与读阿诺德不同,因为从康德、黑格尔的书卷里,我感到是一种亲和力,一种具有强大的同化力量的亲和力,但并没有亲近之感,更说不上亲切了——我曾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扉页工楷抄录了康德的话:“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令律在我心中。”还写了自己的颂词,从而常引起同学们善意的讥笑。但是阿诺德不然,他让我感到亲切、感到亲近,除了逻辑的力量以外,我深切感触的是他的人格、他的举止风度、他的音容笑貌:这一切都跃然纸上,更不必说呼之欲出了——我很晚才看到阿诺德的肖像(见图 1),这副模样跟我想象的基本一致,但是没想到他的领带竟然系得那么勉强,好像是为了照相而挣扎了一番;另外,稍稍留心又会发现,他的羊毛外衣根本就没熨平,只系了一个扣子,而位于画面之外的其余扣子在他看来就无所谓了,衬衣的领子似乎也有问题。

说实话,我过去对阿诺德并不在意,在动手翻译他的文章之前,读的也很少,经常是在阅读西方文论外文材料时,与他的语录不期而遇。虽非大段引用,但那些只言片语总是捷足先登地跃入眼帘,并深深地印入心扉——虽是理论评说,但觉得尤其深邃隽永,与格言警句无异。阿诺德的语录大多十分典雅庄重,如果仅凭只言片语,会很自然地认为他是

一个斯文先生；然而一旦读上一篇，便会直面于一个生动活泛的性情中人。阿诺德的魅力或许可以通过这么一个实例说明：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批评家威廉·迪安·豪威尔（William Dean Howell, 1837～1920）自述，当他听了阿诺德的演讲《爱默生其人》后，不禁时常想到：“啊！这不正是我本应想到要说的话么？”（“Ah! That is just what I should have liked to say!”）^①而当我为阿诺德的连珠妙语拍案时，也偶尔会自我解嘲地对身边的学生说：哈，这不正是我想说的吗！



图1 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 1822～1888

图1中阿诺德的领带系得很勉强，歪歪扭扭的，似乎是为了照相而经过了一番挣扎；他的上衣应是毛呢质地，但很不平整，似乎根本就没熨过；外罩的扣子只扣了一个，而位于画面之外的其余扣子或许在他看来就无所谓了；衬衣的领子似乎也有问题。在阿诺德二次走访美国时，当地一家报纸尖刻地嘲笑了他的装束，其中说到他的中分发型，单片眼镜，衣服很不合身，很不得体（见阿诺德《合众国的文明》，“Civilis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五分之三处）；还说他面目不善，举止傲慢等——不过起码在这里还是慈眉善眼的吧。

^① Robert H. Super, ed., in his *Selected Works (Oxford Authors)* by Mathew Arnold (Oxford, et. 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602.



图2 阿诺德漫画像

图2中阿诺德头戴桂冠,身着希腊宽松袍衣,手中的乐器类似今天的双指板吉他或班卓琴(banjo),戏拟诗神、音乐之神和光明之神阿波罗(Apollo)手执里亚小竖琴(lyre);身边喷射的酒瓶上有“甘甜与光明”的字样(“Sweetness and Light”,此语原出自斯威夫特,由阿诺德发扬光大)。下面写着两行诗句:

诚然荷马也会打盹儿,诗神也曾写下垃圾,
咱家歌手有“波德之死”,他还写了波德——搏击。
[Admit that Homer sometimes nods, that Poets do write trash,
Our Bard has written “Balder Dead”, and also Balder—Dash.]^①

我之所以称阿诺德的作品为美文(belles lettres),不仅因其文笔之华美——尽管这种形式因素的确是作者的另类(distinctness)之处,更重要的是作者对“美”这一概念的独到理解、高度评价和特殊应用,在于这些

^① 波德(Balder,又作 Baldr),斯堪的纳维亚神话(Norse mythology)人物,是“光明”和“美”的象征。

文章“美”的内涵。依我看来,阿诺德意在区分社会政治问题和人性的问题:前者是实用性的,而后者则是不计利害的非功利主义的高层概念;前者位于手段和工具性的操作层面,而后者则是人性、人的本质问题,有关人生的极致和最终目的,是真正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依赖。他强调了两个相关的概念:美感和操行感(the sense for beauty and the sense for conduct)。只有文学才能培养这些意识,所以文学是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能替代的(阿诺德说此语之际,正是现代物理学迅猛发展、文学地位风雨飘摇之时);后者是各自孤立的、知识性的,而文学则教导人们如何以特殊的方式(即艺术的或美的方式),去利用和运用科学的成果(applications)。按照他的逻辑,美(包括美文学, *belles-lettres*)和哲学具有同等的地位,或者说比哲学更高(哲学不属于社会科学),我们中国人对这一点感触不深;而且文科也不应包括社会科学。明确这一点,便立即提升了文学的地位——当然也提升了中文专业的地位,因为只有文学虽不可以救国,但是没有文学则难免亡国的。它的载体是“诗”——理性哲学所不及的层面,正是诗的地平线。

他以高度欣赏的态度引用了爱默生(Emerson)的话:“我们之所以称一个社会庸俗,是因为这个社会尚未写就自己的诗篇。”(见《爱默生其人》三分之一处)在论及人类文明和文化时,他又说:“文化视甘甜与光明为完美的品质,那么它便和诗有着相似的精神,与诗一道遵从这共同的规律。”(《文化和它的敌人》五分之二处)他把“文化的人”和“诗化的人”并列(*men of culture and men of poetry, ibid.*),他对斯威夫特的“甘甜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和发展变奏,并辅之以“美”,与“人性的全面形成”(a human nature complete on all its sides),即“完美极致”(perfection)同论(*ibid., op. cit.*)。他还说:“诗的主导理念是使美和人性的完美体现在各个方面,而这种理念也是真实的,是无价的,尽管它尚未取得应有的成功;征服人类明显的动物性缺陷,使人性在道德方面臻于完善——这同样也是宗教的主导理念。诗,把宗教的热忱和精力添加于己身,则会命定地改造和主宰身外的一切。”(*op. cit.*)因此他盛赞希腊社会和它的诗和美,这不是他由于自己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相应的古学知识而自恋(我们虽然明显地感到他的自豪),而是出于思维逻辑的一贯,他说:“在希腊艺术和诗的最佳作品中,诗和宗教是一体的;美的理

念和各层面的完美人性把宗教的热忱和精力加于己身,并以这种力量工作,为此,它们至今仍有不可超越的意义和教谕性。”(op. cit.)还有:“求美的本能,如同求知和求善一样,是内置于人的自然品性(human nature)之中的。如果是希腊文学艺术呵护了求美的本能而不是别样的文学和艺术,我们便可以信任人性中自我呵护的本能,从而把希腊语作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保留之。我们甚至信任它,从而让希腊语比现在更加流行。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会更理性化地学习希腊语,但是,只有当人们日益深刻地感受到其中的审美要求。”(《文学与科学》,“Literature and Sciences”, passim.)在《合众国的文明》(“Civilis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一文中,他明确地指出了美国社会缺乏美感和美的资源的致命弱点,从而预示了美国在“人性问题”(human problems)方面的黯淡前景,并浪漫主义地把个性和美(distinction and beauty)悬为人生理念和理想:“个性与美是真正人性之所需;若非满足这些需求,文明就不会充分发育;若与这些需求背道而驰,文明将会走向谬误。”(op. cit., 倒数第2段)

这种关于美与人生人世的理念是诗化的,但阿诺德对“诗”的理解也是非常个性化的。在他看来,诗具有严肃的目的和崇高的使命,是心灵的诉说和祈求,是“真”与“善”在“美”的怀抱中的亲和。的确,诗的本义并不主要地在于它的形式和体裁,不在于声韵和格律,而在于所谓的诗意(the poetic values),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在于韵文或者散文——否则我们很难在萨福、荷马、赫西俄德和希罗多德之间作出什么“诗的”辨析了。这一点倒是和中国人对于诗的传统见解互通声息的:首先是言志原道,尔后才是风骨情采之谓,最后才是嘲风花弄雪月。在这种意义上,诗不仅比历史更真实,也比哲学更真实:柏拉图在解说终极理式时往往呈现出诗人本色(所以中世纪认可了他的迷狂,他的“非”理性的精髓,而亚里士多德幸存的主要是形式意义的逻辑方法),黑格尔关于绝对理念的运动过程在这里也不妨看成神话的叙事梗概(当然和希腊神话一样,也是诗化的),而尼采所谓的“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加缪的“西西弗斯说”等等,从根本上讲都不是借诗的神话(或说神话的诗)作为比兴,有别于“关关雎鸠”,因为它无所兴起,不欲再度飞升,而是安居在这些意象之中,是“自为”之物,是“自足”之物。换句话说,也就是到了极致——正好应了“具象以立意”的古训。循着这一思路,就便于理解目

前人类思想文明的困境,便于理解文化垃圾和学术垃圾的缘由——某些文化产品或是想超越“诗”其上,或是甘居“诗”之下,或者更糟的是,回避“诗”——回避“诗”的真义,绕开“诗”的真义,那么必然出现的就是所谓的“焦虑”以及克服焦虑的安慰剂“改编”,于是便由述而不作到越作越多。

阿诺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与他的诗学原则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在精髓上是同一的:他首先要求的是严肃的性质(seriousness),高度的真实和高层的真理(high truth),因此他崇尚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而乔叟却落在他的标准之下;因此他对爱默生的超越理念给予那样热情的反响,写下了最为个人化的评论某一人格的文章《爱默生其人》(“Emerson”)。

阿诺德对于我们来说无疑的首先是批评家,但是他曾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三大诗人之一,竟与英国桂冠诗人阿尔弗里德·坦尼森(Alfred Tennyson, 1st Baron Tennyson, 1809~1892)和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92)齐名。正如他在批评的天地里放飞了诗的精灵一样,在他的诗作里也明显地折射着学术人格的光辉,体现出严肃的社会目的、高尚的社会理念和高度的使命感;正如他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疾呼不计利害(disinterestedness)一样,他在诗的王国却要“激发意趣”(interesting),是一个合理的功利主义者,以至于有人觉得他的听觉对于声响韵律节奏等是迟钝的——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心思并不在那儿,因为他的诗学观念是“阿诺德化”的。对他来说,诗的王国和散文的领地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他能随心所欲地凌空飞翔而穿梭于二者之间,超越二者之上。这无疑是上古的遗风,他的古典语言知识和希腊罗马古学无疑成全了他这一点。对此阿诺德是有所意识的:作为诗人,他宣称自己的使命是标示心灵在19世纪末季的主导动向(the main movement of mind),并希望当人们对这种动向有所感知的时候,他的诗作能得到认可;他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欠缺坦尼森那样赋诗言愁的气质和情怀,也不像勃朗宁那样具有博大的思想境地,但却左右逢源,融合了二者,而且更重要的是把个人的诗情与时代运动的主导轨迹(the main line of modern movement)联系起来,从而将与坦尼森和勃朗宁平分秋色。然而不幸的是,他作为诗人被历史冷落了;但同时幸运的是,他作为文化批评家被历

史热情地接纳了——尽管对他的地位肯定得还远远不够——这一点大概要另有专论才能说清楚：这个人在任何时代都不曾是、也不可能是宫廷的弄臣或宠物(not a court jester or pet)，也不是大众化的艺伎或优伶(not a popular entertainer either)；我们看不出他追随的是什么——显然不是条顿(Teutonic)血脉，也不是高卢(Gaul)风尚，而且与英伦岛国的经验派(Empiricism)似乎也没有亲缘——同时也看不到什么人曾刻意地追随他。他不是主流的(non-mainstream)，而是不入流的(off-stream)和反潮流的(anti-current)。

如果说阿诺德的诗作为言志而欠于言情和言愁，从而具有散文气息的话，那么他的理论批评文章则有着充沛的诗意和温馨浓郁的抒情气息。这主要不是语言风格问题，而是直接出自作者的关于诗与美的理念(idea and ideal)、气质(temperament)、修养(cultivation)，一句话，诗化的学人品格(a poetic personality of scholarship)，是出于逻辑运行的必然，是诗化的哲学。阿诺德把握了一个平衡，他的论说既不是晦涩而牵强的逻辑推演，也不是浮华无本的情感判断，而是用常人的语汇讲述一个超人的思想。在这里我似乎缺乏更好的形容词了，常人也好，超人也好，关键在于人这个中心词，而不在于“超”和“常”的限定和修饰：说的是人话，也是给人听的(我们现在有不少东西似乎不是这样)。阿诺德的著作，用英国当时的自由主义政治家 G. W. E. 拉塞尔(George William Erskine Russell, 1853~1919)的话说，是丝毫没有掉书袋子的说教气息的(without the faintest trace of pedantry)。这与阿诺德的人格是一致的，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乐于社交，具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多元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人格成分：一方面是洒脱自如甚至是显得轻浮的举止风度，良好的幽默感；另一方面则是学者的严肃与诗人的忧郁。他显然是一个非常善良而宽容的人，但他对庸俗是不能忍耐的，对他所认定的错误是绝不宽容的，所以说起话来又是再尖刻不过的，甚至是很“损”的(quite “damaging”)。他反复强调了人(human)、人性(humane)、人的本质(human nature)和“人化社会”(humanised society)等概念，并以此带动了人格(personality)、性格(character)、个人(individuality)、个性(distinction)等概念，并希冀在人性与自然之间(between human nature and Nature)，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在个性与共性之间求得一种“和谐”(harmony)与“合

协”(fitness),从而完成心灵对各项主题的自由嬉戏(a free play of mind on all subjects),全面实现完整的完满的人的本质(complete human perfection),而这一切需要的仍然是美,是诗,是“甘甜和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这种理念,在阿诺德看来,在古典时代曾实现过,那是一个诗化的社会,亦即人化的社会;要回归这个社会需要引路的智者(men of light and leading),在这一点上,作者即便不以引路智者自居,也是以此标准要求自己的。在这种意义上,阿诺德是反传统的,反规范的,或者以幽默的口吻说,是文化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最讨厌的就是自以为是:“稍有一知半解便跑到大街上去立法治众!”(《当前文学批评的功能》)所以无论美利坚的机制(institutions)还是法兰西的法制(constitutions)都是跛足的,因为它们忽视了一个永恒之法(eternal law),忽视了内向的认识(inward recognition)。阿诺德频频称道希腊的哲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与希伯来的先知(以赛亚、耶米利等)——遗憾的是他没有提到中国的夫子孔孟老庄等——但并无一言兴邦的做派,否则将会违背自己的逻辑而自我否定[除了社会、政治和法制问题外,还有人性的问题(human problems),因此以法则和共性淹没个体和个性的企图是徒劳的]。个人自由不应妨碍他人的自由,个性的伸张不应限制他人的个性,这是个性自由概念与那些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本质区别。阿诺德虽然没有“异化”(alienation)概念,但是他的一系列色彩互异而在精神上密切相关的概念,如“完整人性”、“个性”、“性格”、“美”、“诗”、“谐”、“协”、“完善”、“心灵对各项主题的自由嬉戏”、“不计利害”、“高远”、“甘甜与光明”等等,无一不在点触历史——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问题。他所进行的不仅是逻辑的批判,同时也是情感和道德的批判,是诗的批判。在这种意义上他是浪漫主义者(不仅在诗风上),他没有缅怀中世纪,而是追回了古希腊——但是,有人说他是介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人物,那么是否可以说,他是在现代派的高度,根据时代和未来的需要,力图光复古典的旧物呢?我以为在这个方面,阿诺德的意义是很值得开拓的:他的生命跨度并没有真正抵达世纪的两端,但其理念的长虹不是实实在在崛起于西部湖区,横贯并超越了“已经死亡”(“one dead”)的19世纪后半叶,并把自我提升到那个“无力诞生”(“powerless to be born”,两者均为阿诺德语)的崭新纪元了吗?——聊举一例,有人认为他的诗歌《多佛海滨》

(“Dover Beach”, 1867 年)是较早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代表作品,因为它所描绘的梦魇般的世界里,宗教的真义和确定性都变得黯淡模糊了;然而我们没有忘记他自幼就是华兹华斯的近邻,而且说自己就是“华兹华斯味儿”(Wordsworthian);而更有说服力的是,他像希伯来先知一样对爱尔兰问题作出的“预言”,难道不是在他身后的 120 多年中(直至眼下的 2009 年 8 月),都在一步步地应验吗?

以上记录了一些直觉感受,算作译序好了。也想借此机会感谢金惠敏先生(我的本科同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意,谢景和先生(本科同班同学,河南大学出版社特约编辑)在这一工作过程内外的指导,还有孔凌波同学(Libby Kong,我的学生)对书中各篇的校订和编译。

最后谨以拙译阿诺德的诗行(刚才提到)作为结语:

两重世界间
徘徊复飘零
其一业已死
另一无力生
吾心何所倚
吾身落此境
但有一匹夫
独候尘埃中

——《“沙特勒兹”大修院之歌》

[Wandering between two worlds, one dead
The other powerless to be born,
With nowhere yet to rest my head
Like these, on earth I wait forlorn.]

“Stanzas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

贺涓滨(禾本)

爱丁堡, 2009 年 8 月

目 录

感于阿诺德的批评美文(代序)·····	(1)
---------------------	-------

译 文

当前文学批评的功能·····	(3)
文化和它的敌人·····	(31)
文学与科学·····	(57)
爱默生其人·····	(76)
数;或作主体多数与残存少数 ·····	(105)
合众国的文明·····	(126)
论民主大众·····	(146)
心理的平行·····	(172)

评 论

现代“先知”与后现代的救世之道·····	(217)
----------------------	-------

附 录

阿诺德生前身后的爱尔兰·····	(251)
阿诺德生平与创作概要·····	(256)

后 记

阿诺德研究的到底是什么·····	(263)
------------------	-------

译

文

当前文学批评的功能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①

我曾对荷马史诗的翻译问题发表过若干评论,其中斗胆涉及一个论题,一个招致诸多非议的论题——文学批评及其当今的要旨;我是这样说的:“对法国文学和德国文学,如同对待普泛的欧洲思想文化一样,多年来我们的功夫主要是理论批评,我们通过神学、哲学、历史学、艺术和科学等知识部类,努力发现我们的研究对象自身到底是什么。”感于英国文学中某些动因的运作,我又添了一句:“大概可以说,了解英国文学的最终目的——这也正是欧洲人的热望——大凡不外乎理论批评而已。”这样一来英国文学的活力和价值就受到损害。不止一人曾向我发难,说我对文学批评的估价太偏执了;他们还强调说,人类精神内在的艺术创造力,比理论批评的努力要更胜一筹。又有一日,我读到舍尔普先生(Shairp)^②有关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精辟论述^③,这使我重温了华兹华斯的传记,并发现了这位我时刻洗耳恭听的大师有一句论及批评的话,它似乎为各种极尽能事指摘文学批评的言词正了名分。华兹华斯在一封信中说道:

当这刊物(《评论》,Reviews)^④的作者们在审判自己不名誉的营

① 作于1864年——译注。

② 舍尔普(John Campbell Shairp, 1819~1885),苏格兰批评家,文人——译注。

③ 见 John Campbell Shairp,《华兹华斯:其人其诗》(“Wordsworth: the Man and the Poet”),《英国北方评论》(North British Review), 1864年第41卷, pp. 1~54——译注。

④ 作者原有括号插入——译注。

生时，我们没法想象他们的心灵能乐意接受像纯诗这样美好事物的感染。^①

出于同样目的，有人可信地引用了他在一次谈话中更具匠心的论述：

华兹华斯把批评力(critical power)看得很低，无限地低于发明力(the inventive)。今天他还说，如果把评论他人著作的时间用来进行原创，无论什么形式，都会更尽其用，更得其所。这样做能使人快些发现自我的水准层次，而极大地减少害人勾当。错误的、有害的批评对人心灵有巨大伤害，然而即使一件艺术庸品，无论诗体还是散文，都是相当无害的。^②

如果期望一个人一方面能搞点文学创作，而另一方面为了社会更高的利益而情愿降灾于自身从而堕入无能无为的灯火阑珊处，这种期望对于可怜的人性来说委实太过分了吧；假如我这观点成立，那么华兹华斯所谓的那些从事“假象的，或者说恶意的批评活动”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但是得承认，如果华兹华斯所谓的那种假象的或恶意的文学批评从来就不曾有过，则岂不更妙！人的批评机制较其发明机制来说真的略逊一筹吗？大家都能诚心认同这一点吗？这是普遍的共识吗？即便如此，理论批评自身真地毒害人心并损害人格吗？任何用来评论他人著作的时间都远不如用来进行任何形式的原创性写作吗？难道我们但愿约翰逊(Johnson)继续写作《艾伦斯》(Irenes)^③，而不要写《诗人生涯》(Lives

① 见克里斯托夫·华兹华斯(Christopher Wordsworth)，《威廉·华兹华斯其人其事》(Memoirs of William Wordsworth)，London: 1851, ii. p. 53——译注。

② 见克里斯托夫·华兹华斯(Christopher Wordsworth)，《威廉·华兹华斯其人其事》(Memoirs of William Wordsworth)，London: 1851, ii. p. 439——译注。

③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俗称约翰逊博士, Dr. Johnson, 1709~1784)，诗人，散文家，道德论者，小说家，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词典编纂家。詹姆斯·鲍斯维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以他为主题写了极其著名的传记《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Life of Samuel Johnson)。《艾伦斯》是他的早期文学创作，新古典主义风格——译注。